

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的外国名言



2019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题为《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的致辞。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释中国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解，把环境保护列为全球发展的三大任务之一。在论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美能拯救世界”，用以强调“为子孙后代留下碧水蓝天的美丽世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次演讲擘画了各国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宣扬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全球治理观与国际责任观，传递了各国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诞生于莫斯科一家慈善医院的医生家庭，59年的人生中始终伴随着贫穷、不幸、病痛与困苦。作家幼年在虔信宗教的父母影响下，熟读福音书与俄国史，养成了极其敏感的心性。作家青年时笃信空想社会主义，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因此触怒沙皇当局，在断头台上体验了必死的绝望，后遇赦免而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作家中年时因连续失去妻子与兄长而意志消沉，为偿债和治病而放逐欧洲列国，不断淬炼精神。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苦难磨砺了陀翁求索人生奥秘的执着。“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灰暗的人生提供了不竭的灵感与无穷的素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传世名著不断问世，一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艺术形象接续涌现，奠定了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大师的地位。

在彼得大帝改革百年后，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对西方亦步亦趋，深入反思欧洲文明的缺陷与建构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他的小说犹如音乐作品中的“复调”，通过大量人物对话、

心理描写，把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置于同一场域中争鸣激荡，借此批判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继而提出自身对俄罗斯性格与精神的理解。他的作品与思辨，一则闪耀着人民性光芒。陀翁亲近普罗大众，与之同呼吸、共患难，比一般作家更能敏锐地寻找民众的根基、理解他们的内心、接纳他们的精神，力图通过宗教思想粘合上下阶层的分歧。二则蕴藉着民族性关怀。陀翁认为，民族是上帝的载体，东正教信仰真正的基督，构成俄罗斯民族的鲜明底色。同时，陀翁贬斥单纯的斯拉夫主义，宣扬一种世界主义性质的爱，主张“俄罗斯人的使命也就是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就只能意味着成为所有人的兄弟，也可以说是成为全人类的弟兄”。民族的爱也是世界的。陀翁在民国时便已享誉中华。鲁迅先生高度赞扬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一位“残酷的天才”，一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美能拯救世界”出自陀翁中后期成熟的长篇小说《白痴》，传神表达了他对俄罗斯精神的理解。在陀翁看来，美具有宗教内涵，“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白痴》小说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为他所创作的堂吉珂德式人物，与《红楼梦》里贾宝玉也有几分神似。梅什金公爵是一个海外归来的癲病病患者，相信美的力量，以纯真、温顺、宽忍、博爱、慷慨的基督精神对待周遭的流俗、沉沦与算计。然而，独醒者不为众醉所理解，圣愚反而受讥讽为白痴。在小说中，公爵无论怜悯的爱，还是真情的爱，都不能拯救任何人，尤其是对美的化身娜斯塔霞的毁灭无能为力，最终真正沦为白痴。这出悲剧意在表明，当时的世俗世界还不具备接纳这种美的条件。“美是理想，而理想，无论是我们还是文明的欧洲，都还未形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习近平总书记极为熟悉和欣赏的俄罗斯作家。习近平总

书记在青少年时便饱览俄罗斯文学经典，受陀翁作品的滋养，在许多场合都提及这位世界级文豪，称赞他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习近平总书记把陀翁名言当作中俄乃至中外文明互鉴、心灵契合的媒介。第一层有致敬之意。圣彼得堡是陀翁成名之地、终老之处、埋骨之所。小说《白痴》的故事情节主要发生于此。在这座历史名城引用这句话，实属恰如其分的风雅之举。第二层有寻共鸣之意。陀翁思想中所蕴含的济世之美，是两国文明的共同追求。陀翁强调：“把人联合起来靠的不是刀剑，而是兄弟般整合的愿望。”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等圣贤之说同样强调了精诚合作、互惠互利的广阔前景。第三层有超越之意。陀翁认为，自欧洲扩散而来的工业文明助长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堕落、信仰涣散。他极为担心“上帝死了”使人类失去约束，陷入为所欲为的境地而自取灭亡。在解决问题上，他无疑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中，堂吉珂德、梅什金公爵和贾宝玉的行动因此统统都失败了。不同的是，中国人民虽然赞同工业文明对自然乃至精神世界造成了某些病症，但是主张唯物主义的解决之道，激发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以负责任的社会实践来追求物质与精神、天与人的合一境界。给美注入实践的内涵，它才能具备拯救世界的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也以此关切自然之美、济世之美、实践之美。自工业革命以降，人类社会长期经历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道路。物质文明尽管取得长足进步，大自然却遭到系统性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严重威胁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关系到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和人类命运。中国牢记生态和文明兴衰与共的历史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推动构建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实践进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三大行动逻辑。第一，正人须先正己，办好自己的事是合作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总体布局中，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成效之著前所未有。在“十三五”期间，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相继奏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得到系统改善。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政府把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中，推进“减污、降碳、强生态”协同增效，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升级。第二，利他也能利己，利益不可分割性是合作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庄重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倒逼”国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第三，单边不如多边，有事大家共同商量着办是合作原则。中国政府签署加入50多项多边环境条约，积极充当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议题的拥护者、执行者与引领者。同时，合作不代表无立场与无原则的妥协。中国政府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抵制以绿色为名义的新型贸易壁垒，捍卫新兴经济体的正当权益与发展空间。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矢志不移地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体现对子孙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的大国格局。除本身价值外，美丽家园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通过议题联系，能够起到大国合作的黏合剂与战略竞争的减压阀之效。清洁美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目标，也是助益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等价值实现的途径。由此可见，美经由实践确实能够拯救世界。

发达国家的国土空间治理经验

□ 杜丹宁

国土空间指国家主权及主权力管辖下的地域空间，是国民生存的场所和环境，包括陆地、陆上水域、内水、领海、领空等。国土空间治理则是指以空间发展战略、法规与规划、区域政策体系为核心内容，由政府管理、市场机制、社会治理等为参与者共同参与，通过资源配置实现国土空间的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利用及各地区间相对均衡的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国土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构建系统、有序、全面的国土空间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国土空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统筹兼顾，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依据与保障。德国各个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均有对应的法律依据，如《联邦空间规划法》《建设法典》为国家联邦空间规划提供法律支撑，《州空间规划法》《空间规划条例》《州建设利用条例》为州和地方空间规划提供法律支撑。英国出台的《规划和强制购买法案》，详细规定了中央和地区的权力与职责，地方政府拥有规划的制定权，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方向制定涵盖土地利用、交通、环境等多方面的空间规划，国家与省级政府拥有不同尺度的规划决策权，对不同地区发展规划的决策与实施横向调控，平衡各区域的发展。新加坡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空间资源的分区、测算标准，在法律层面为规划分区提供了保障，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设立了国土资源分类标准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人口发展白皮书》从人口规模维度明确了各功能用地的测算指标需包含维护高质量的人居环境和

满足新增人口需求两个角度。为解决规划冲突重叠的难题，荷兰整合涉及土地利用、水资源、环境、矿产资源开发、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法律法规，于2016年通过《环境和空间规划法》审议，建立了“多法合一”“多规合一”“多证合一”的国土空间治理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配套政策，健全规划实施体制机制。配套政策与协调机制是国土空间规划落地的制度保障。各国构建了不同规划实施机制协调各级政府与部门，以期实现国土空间治理工作平稳推进。英国积极推动地方和社区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发布《地方化法案》，规定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社区、开发商、土地所有者及其他利益集团共同制定地方规划，并建立协作机制推动政策有效实施。新加坡逐步探索“用什么管什么”的目标导向机制，在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将城市空间进一步分为工业用地与公共住宅用地，由代理机构裕廊集团负责工业用地开发建设管理，由建屋发展局负责公共住宅建设，负责不同功能空间的政府部门与代理机构需制定土地出让、开发建设管理规则并进行后期运营。荷兰立法规定各省需设立由各级政府官员组成的“省级空间规划委员会”，协调各级政府空间规划政策，并建立对角协调机制，通过设立点对点的工作小组对涉及国家、省、市三级政府多个部门的大型空间治理项目进行协调。德国建立了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境评价的联动机制，通过信息和数据的共享、部门咨询和协调，对重大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实施评价，保证各类空间资源合理有度的

开发。

探索科学的动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国土空间治理横纵监督机制。动态监测指标体系是国土空间治理横纵监督机制构建完善的重要基础，通过动态监测，国家将及时得到相关治理措施的落实情况信息，并可依据这些信息在监督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调整其运行轨迹。这对加强地方国土治理相关情况的审查监督，压实地方政府国土治理主体责任，实现生态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横纵目标监测体系，通过量化的指标来动态监测空间治理工作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完成情况。在区域层面，基于5大空间发展目标，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区域空间战略监测指标体系。在地方层面，基于不同地方国土空间战略目标构建地方空间战略监测指标体系，如曼彻斯特空间规划目标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目标、69条二级政策和97项三级指标构成。荷兰着重发挥第三方的作用，对国土空间治理评估监管。在国家层面设立部委规划的监督委员会，探讨规划报告的新问题，监督规划项目的实施；设立独立智库机构，提供空间战略性政策研究年度报告；组建独立规划咨询机构，由来自学界、政界及商界的成员代表社会评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新加坡搭建了面向政府管理机构和社会公众实时同权开放的一站式信息共享平台，公开发布规划编制成果、规划管理信息与综合市场信息，为社会监督国土空间建设行为提供常态化的抓手。为保证政府能以最小代价获悉底层状态，德国建立了包含监督机构内部的监管、外

部审批及层级间沟通的监管体系协同协作机制。

发挥社会主体作用，扩大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范围。国土空间治理涉及各部门和全民利益，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推进多主体协商机制，是调动公众积极性，增强公众政治责任感，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保证国土空间治理方案顺利实施的根本要求。英国意识到居民是国土空间治理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出台的《邻里规划》，赋予地方社区居民直接参与构思当地发展愿景的新权利，为社区自行制定规划政策提供法律保障。并完善主体参与机制，由地方政府机构、专家、地方居民、开发商等各利益团体协商共同制定地方规划。新加坡规定规划区划开发强度修改与土地出让必须经过公众审查认可，土地出让投标前的公众意见征求结果须作为必要的投标文件提交。新加坡同时建立了政府管理机构与社会公众的共享平台，拓展了公众参与渠道，为实现公正公平空间治理提供保障。德国《空间规划法》规定，制定空间规划目标与空间规划计划时必须要有公共部门和公众的参与，公众可以全程参与调研、规划的制定及监督工作。《建设法典》则要求需在规划草案公示前将规划总体目标、规划方案及规划方案实施可能造成的影响告知公众，接受公众审查并提供解答，建设规划方案应基于公众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可见，在德国，公众参与不但贯穿国土空间治理全过程，也得到法律支持，公众的及早参与有利于提高空间规划的接受度，也使得空间治理过程更加开放和透明。

（上接1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的这条道路，前人没有走过，每走一步都几乎找不到完全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每前进一步都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问题作为自己行动的导向，不断研究和遵循历史规律，善于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而不断开拓创新，独立自主地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这种奋斗，是随时面临着风险挑战、安中有危、危中有机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始终面临着各种各样甚至难以想象的巨大风险挑战，但这个党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总是迎难而上、面险而行，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沉着应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全党力量特别是人民力量，最终取得胜利。这个党的一大特点，是始终不忘提醒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她深知，以往的斗争和胜利的成果，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得来的；以后的斗争胜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能够把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一个具有强大领导力和执政力的政党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党更要有大党的样子。中国共产党自走上历史舞台那一天起，就把为大国掌舵领航的重大责任扛在肩上。但要引领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且从积贫积弱困苦中走来的大国前进，中国共产党每走一步所面临和解决的国内外难题，都是世界上其他政党难以想象的。由此要求她必须具备强大的领导力和执政力。

这种领导力和执政力，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是体现在党中央的坚强有力上，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革命、建设、改革顺利推进，保证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国家长治久安；二是体现在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路线和战略策略上，她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和实现阶段性目标，总能使这些目标一步步变成现实；三是体现在决策部署基本都能够得到有效贯彻上，她的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和完善法治，保障了党的决策部署及时、坚决、有力地贯彻执行；四是体现在能够团结和凝聚各方力量上，她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和相互支持的力量；五是体现在特别注意建立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上，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她不仅有着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而且善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和执政力，在于她能够把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的国度里的亿万人民团结和凝聚起来，从而创造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进而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次次把社会发展中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这一点，不是谁自封的，更不是其他政党都能够做到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能力。一百年来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执政力，也为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果所印证，为人民群众所认可。

“走在时代前列、保持青春活力”——一个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们“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何以始终保

持着这样一种青春活力？

这部文献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活力，首先来自于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气氛。在制度上，她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运行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在民主气氛中，她倡导和建立了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活力，还来自于她勇于自我革命，特别是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贯正确、不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对待自己失误和错误有着健康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这就保证了她在带领人民前进过程中始终具有旺盛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活力，还在于她时刻注重学习，善于总结经验。依靠学习增强本领，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每遇到挫折，都要汲取教训，在总结成功经验和汲取失败教训中逐步成长和壮大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活力，最让人钦佩的在于，当她自身肌体出现问题或受到毒害时，敢于刀刀向内，对着自己刮骨疗伤。能够坚决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现象作斗争，不断医治病症，坚决铲除毒瘤，保持肌体健康。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具备了上述这些青春活力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仍不断告诫自己的党员：在未来路上，我们仍然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各种危险和各种内外考验，要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经受住各种挑战和考验，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

“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一个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致力于为人类进步事业努力奋斗。她始终秉持的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弘扬的是国际主义精神，始终投身的是历史的大势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从不以一己私利去处理国际问题，而是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个党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理念。这个党和国家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平安宁方面，发挥了并仍在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当今世界，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参与，很难得到妥善解决。中国自身是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受的贫困和苦难感同身受，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为需要帮助的国家 and 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个有远见的政党之间开展国际合作，中国对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的各种抗疫援助，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从这个党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提出的主张以及她的所作所为看可以清晰地作出判断：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中国共产党基本特征，让国际社会真实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逻辑和发展密码的重要文献。这部重要文献是“精准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和特征的经典文献。中国共产党有本事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有本事讲好自己的故事。我们一定能够构建具有广泛而深度国际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和国际叙事体系。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